

我与诗词“若即若离”

严修

我与诗词的关系，可用“若即若离”四个字来形容；也可用“经常接触”和“敬而远之”八个字来描述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。“中国文学史”是主干课程，学时多，延续好几个学期，分段主讲的教授是蒋天枢、王欣夫、朱东润、刘大杰、赵景深。“中国文学史”的重中之重是诗经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。当时学习苏联，期末考试采用口试方式，考官的几道题目中，必有一题是要背诵几首诗词。因此，同学们为了应付考试，都要记诵大量的诗词。同班才女林英（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）记忆力强，掌握的数量最多，屡得高分，如果当时有电视台的“中国诗词大会”，同学们一定会鼓励她去打擂台。我能背诵的诗词远远比不上她，但我的成绩也还可以。这主要靠平时成绩来弥补——朱东润先生讲课喜用启发式，常将诗文中

的疑难之处提出来进行讨论，同学们像猜谜语，争相举手回答，我猜中的次数较多，大概朱先生把这些计入了平时成绩。所以我能猜中，有个“秘籍”，那就是我入学后在“中文系怪人”赵宋庆先生那里借阅过的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。此书作者为清代俞樾，后来刘师培、杨树达、马叙伦等又加以续补。这是一本被誉为“发蒙百代，梯梁来学”的训诂学名著。由于这本书的帮助，故而诗文中的一些疑难，我能略知一二。

我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属于语言教研组，讲授过中文系的基础课“古代汉语”，还协助张世禄先生主编过《古代汉语教程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）。教材的通论部分，有专门章节讲古代诗歌的格律，说明格律诗（含律诗、词、曲）与非格律诗（含先秦古诗、汉魏六朝古诗、古体诗）的区别，解释字数、押韵、对仗、平仄以及黏对、拗救、词牌、摊破、减字、衬字等概念。教材的文选部分，有“韵文”专章，从中可以欣赏到从先秦到唐宋的古典诗词精华。

在古代诗人中，我对陆游较为熟悉

人生的某一阶段，我曾终日游荡在故乡的群山深处，携一册闲书，很多时候却只是枯坐发呆，眼望昔日同伴渐行渐远，我的人生却仿佛停顿下来了。看着朝晖夕阴、雾霭山岚，脑中盘桓的常是古人的诗句：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”“旷野莽茫茫，乡山在何处。”“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后来，我终于走出了那段“失群”的时光，感谢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们，没有他们的陪伴，那些日子一定更加黑暗、漫长。

我与诗词结缘，得益于我那颇具文青气质的父亲。他对我的识字教育便是以古诗为单位，至今仍记得他每次将一首诗工楷写在白纸上教我诵读。就这样，我得学的字足以看报纸时，我背的诗也有上百首了。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教育中，这是不太寻常的。较之诗，我与词相遇较晚。五年的暑假，父亲带回一本《宋词百首钢笔字帖》给我习字，于是那个夏天我一遍遍写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”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”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。”……结果字没练成，字帖内容倒是记下了。这以后苏轼、李清照、秦观、柳永等人的作品赏析集，手边能找到的都读了。后来看到“口齿噙香”，“含英咀华”这类词，一下就喜欢上了：这不就是我读诗词时的感觉嘛。

人生总有一些冗长无聊又不得不去的课、会议，在智能手机时代到来的前，我的应对方式是笔记本上随意默

一点。曾编过一本《陆游爱国诗词选解》（中学生文库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还编过一本《陆游诗集导读》（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，巴蜀书社，1996年）。说起这本《陆游诗集导读》，还有一番经历。这个选题原先决定由朱东润先生承担。朱先生在陆游研究方面有丰硕成果，著有《陆游诗选注》、《陆游选集》、《陆游研究》和《陆游传》。所以这个选题由朱先生承担，是驾轻就熟，最为合适。但朱先生年近病卧，无法接受这项任务。于是从书编委会急忙寻找接替人选。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杜月邨先生、颜应伯先生，向丛书主编蔡尚思先生推荐了我。蔡先生也认识我，他曾为我班讲授过“中国通史”。就这样，我接过本应由朱东润先生承担的担子。大约这就叫“蜀中无大将、廖化作先锋”吧，我成了续貂的“狗尾”。十多年后，经过修订，《陆游诗集导读》更名为《陆游诗词导读》，作为“国学大讲堂丛书”之一，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09年再版。

对中国古典诗词，我读过，教过，编过，所以说，与它经常有接触。然而我对格律诗的创作实践，却是有意回避，敬而远之。我不写诗，原因主要有三点：

第一，我对格律诗的创作有敬畏之心。我对古今有成就的诗人十分崇敬，他们天资聪颖、才气超人，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。而我禀赋鲁钝，比较刻板，缺乏形象思维，没有诗人的气质和灵性，自忖不是写诗的料子。格律诗的规矩既多又严，觉得像是带着镣铐跳舞，使我没有勇气去尝试。

第二，中文系学科规划的限制。当年明确规定，中文系是培养中国语言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的。不少同学是怀着作家梦来的，而老师们却反复告诫：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；在校期间，主要是听课、读书，不提撰写文章；即使写文章，也只能写研究性的学术论文，不要写诗歌小说。工作后，升等晋级，要考核教学业绩和科研成果。学术性的论文

和著作算是科研成果，而创作的诗歌小说却不算。这根指挥棒很厉害，使中文系的广大师生远离了文艺创作的园地。我有几个友好的同事，很有才华，具有诗人潜质，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很重，诗歌创作的才能无法充分显露。直到退休以后，卸下了担子，摆脱了束缚，才能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“老有所乐”的选项。他们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诗词，成为诗坛翘楚，获得很多赞誉。我衷心祝福他们！

第三，受一些古人偏见的影响。宋明时代的几位大儒，如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、王阳明，他们对诗文、书法抱有一种奇怪的偏见，认为诗文、书法是“霸道”“妨道”的“小技”，是“陷溺”，并扣上“玩物丧志”的大帽子。

他们的原话是：“问：‘作文害道否？’曰：‘害也。凡为文，不专意则不工，若专意，则志局于此，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？’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

“明道（程颢）先生曰：‘忧子弟之轻俊（志轻才俊）者，只教以经学念书，不得令作文字。子弟凡百玩好皆皆志。至于书札，于儒者事最近，然一向好着，亦自丧志。如王（王羲之）、虞（虞世南）、颜（颜真卿）柳（柳公权）辈，诚为好人则有之，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？平生精力一用于此，非为徒废时日，于道便有妨处，足知丧志也。’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）

“朱子曰：‘作诗以句数适体亦无妨，但不用多作，盖（多作）便是陷溺尔。’”（清·张伯行《续近思录》卷三）

“弘正间（弘治，明孝宗年号；正德，明武宗年号），京师倡为词章之学，李（李梦阳）、何（何景明）擅其宗，阳明先师（与之）结为诗社，更相唱和，风动一时，炼意绘辞，浸淫述作之坛，几入其彀。既而翻然悔之，以有限之精神，弊于无益之空谈，何异隋珠弹雀，其味于轻重亦甚矣。……社中人相与惜之：‘阳明子业几有成，中道弃

去，可谓志之无恒也。’先师闻而笑曰：‘诸君自以为有志矣，使学如韩、柳，不过为文人，辞如李、杜，不过为诗人，果有志于心性之学，以颜（颜回）、闵（闵子骞）为期，当与共事，固为第一等德业。……盖天盖地，始是大丈夫所为，傍人门户，比量揣拟，皆小技也。’”（《王龙溪先生全集》卷十六）

我当初看到大儒们这些偏激的看法，非常惊愕，似乎有天旋地转的感觉，对我平素的认知是个颠覆性的冲击！但后来仔细想想，如果“换位思考”，这几位理学大师的想法，也有其合理性。他们站在正统儒家立场，要维护儒家道统，希望子弟们专心致志钻研儒家经典，“第一等德业”是立志做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圣人。要做圣人，就不能再做诗人、书法家。人的精力有限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这也是常理。这与过去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的道理有些相似。

宋明大儒的看法，对我也有一定影响，像被打了局部麻醉剂，真的与书法诗文“断了联系”，认为确实应该：心无旁骛，不搏二兔，一心一意教书、做学问。

很庆幸我已经退休多年了，可以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似乎麻醉剂的药效已过，我又与书法诗文“恢复了联系”，也已没有“玩物丧志”的顾虑。平时常常翻阅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欣赏历代书法珍品，还常在电脑上观看“田蕴章书法讲座”。为了认识草书，我读过《孙过庭景福殿赋》、《草诀百韵歌》，还临摹过于右任的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。我爱读案头的古代诗词，也喜诵亲友所赠的诗文，例如外兄厉以宁所著《厉以宁诗词选集》，黄润苏的《澹园诗词》，林家英的《雪泥鸿迹小集》等。

说来惭愧，我如今只爱坐在电脑前，用“一指禅”笨拙地敲击键盘，写一点文史随笔；而对格律诗的创作，始终不愿触碰，由于对它敬畏，只能藏拙了。

笔会

首席编辑专版

喜欢诗词的学者虽多，但他们和诗词的关系却各不相同，细究起来煞是有趣：日语专业出身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施小炜，他多年酷爱用中文创作旧体诗词，这应可视为精神上的执着“返乡”；中文系出身的语言学家严修，对格律诗却只读（编）不写、若即若离，则近乎一种文化上的“近乡情怯”了。

只要诗词给人带来滋养、激励与慰藉，算不算“第一等德业”又何必计较？宋明大儒的偏执，令人一笑了之吧。

——潘向黎

没有什么永恒，这样一来便能淡定从容许多。

王小波说：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”当人生中有诗词，面对秋光萧瑟，你看到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；面对青春流逝，你看到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”；面对人生而不平等，你看到“郁郁涧底松，离离山上苗”；遇到高洁的人遭遇坎坷，你看到“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薛荔墙”；看到有人夫妻互相算计，你看到“美人调太玲珑，我亦阴符满腹中”，遇到有人拥有许多却不快乐，你看到“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”。借了诗人之眼，看世间万物便飘逸灵动起来。

最近诗词大会大火，有一个段子也跟着火了：读书和不读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答案是：读了书，看到晚霞与归鸟，你会说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如果不读呢，你就只会说“卧槽，好多鸟。”少年人的头脑是一张易染色的白纸，那么是浸染“两只蝴蝶”、“老鼠爱大米”好呢，还是浸染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好呢？

但也不是人人都需要学诗词、背诗词的。见过一些小时候被填鸭了《唐诗三百首》的，结果未及成年就尽数还给书本了。诗词还是诗词，他还是原来那个他。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女儿选择大学专业时曾对她说：“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，就是自己最相宜的”，这话极是，性之所近，去亲近，否则必然是人与诗词两相辜负。

记得少时背会的第一首唐诗，是崔颢的七律《黄鹤楼》，其时我好像已经就读小学二年级，与当下恨不得在娘胎里就将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孩子们相比，显然远远落后在起跑线上了。那应该是“文革”爆发前一年，家母还能够有点闲情逸致，教我背诵了一些唐诗。后来还曾学习过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——第一次读《红》，我还是个小学生，在用作厨房的后披厦，躺在灶前小堆稻草上（家祖母是农家出身，偏爱柴火灶，稻草是买来当燃料用的），偷偷读完了劫后幸存的一套人民文学版三卷本。后来百姓们也可以公然阅读红楼了，那个岁月，有一部真正的名著可读，对于饥渴于铅字的人来说，不啻为一道福音。还有一部《水浒传》，情形也与此类似。

平生作的第一首诗，是跟咏叹，吟咏小院里的几树槐花，七绝。刚进初中时鹦鹉学舌的少作，长大后不敢示人，付之一炬了，只记得首句“肥城五月落槐花”，是学的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，一比便可知何等地寡淡无味，天差地远。填的第一首词是一阙《诉衷情》，则作于高中毕业后待业家中的短暂时期，于今遍寻不见，想来也与其它少作一道，付诸丙丁了吧。还记得曾经拿去给热爱旧诗词的同学看，同学背地里将它出示与教语文的钱老师，一位曾经的国民党军少校，专司文案工作的，颇通诗词。钱老师与家母是多年同事，用其乡谈风阳话对家母发表月旦道：“写得可悲的了。”

大约是指出中指有感慨鬓生华发的句子吧。年纪轻轻便出此言，无疑便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了，然则却也并非一味地无病呻吟。其实我读高中时，后脑勺便生出一圈白发，俗称“少白头”，故亦不妨说是写实。加之当时小至个人大到家国皆可谓风雨飘摇前途未卜，要说悲，原也是事出有因。而我至今仍以为，赋诗填词，本就不同于饮食男女，并非日常之必不可缺，十足倒是矫揉造作的营生，迂曲也要夸张也罢，均属在所难免，吾辈不可也不必介意。每月开社一次，事先由我布置个宽泛松散的诗题，不拘体例，山人与居士做好携来，再由我细细修改润色。三人诗社坚持二载后，将作品集结付梓，是为后果，也算得是功德圆满。后来余亦吟社又坚持了一轮，社员各积作品廿余首，本拟再出一本诗集的，无奈嗒月山人遽然退出，又不肯言明缘故，第二本诗集遂成画饼，诗稿也不知所终了。

寓居东国，丰富了阅历，增长了学识，拓宽了视野，滋润了生活，然则灵魂深处似乎总有一缕漂泊感飘来拂去，心绪复杂，颇难描状。做过几首《临江仙》，虽说是画虎类犬，庶几也算传递了一些个中消息：

画锦鸂鶒泊水村
声声杜宇柳边闻
飞霞处好栖颯

梅自逍遥看自乐
花开何地不为春
且凭杯酒长精神

插队不足两年，高考恢复，我于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攻读日本文学。入校时，上面还有两期工农兵学员。进校不久，外文系就举办了一次“赛诗会”，根据指导员指示，我也做了一首七律，题为《赞科技大军》，还获颁二等奖，得了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。如今回想起来，仍不禁诚恐诚惶，汗出如浆。

学习日文，其实并非我本意。其时已然明白了自己不适合务农，一心跳出农业界，求学深造，至于学习什么，倒在其次，学啥皆无可可。而当年复旦外文系在皖只招收两名日语，无从挑选。不过学了之后方才知道，学习日语之于写旧体诗，原来还是大有裨益的：日语中完整保留了入声字发音。像我这种从小庭训不严，不曾认真背诵过韵书者，可算是讨了大便宜。

四载寒窗，正值青春年华，一如同辈学友，年轻求学者欢愉欣悦自然体验了不少，情感思虑上的烦恼苦闷当然也缠绕不去。曾填《蝶恋花》一阙，形状自己，题曰“本意”：

浪迹天涯寻异草
不见蓬莱
烟雨昆仑渺
惨绿愁红心事恼
锦瑟弦断知音少

夜夜芳魂残梦绕
但怕醒来
寂寞催人老

到了2007年，终于决意卷起铺盖，携妻归国定居。离东前，作五律一首，告别众师友，算作骊歌。诗曰：

阮展浪游倦，金风十八黄
无人延郭隗，有道遣冯唐
脚踏辽东鹤，仓皇浦岛郎
放歌归去也，挥手向吾乡

颈联对句用了东国浦岛太郎的典故，略类刘辰阮翁旧事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瞬归来已满十载。十年间，继续舌耕，教书之余做些日本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，同时作为兴趣，诗词写作也偶一为之。由于我生性疏懒，赋诗填词都是率性而为随意挥洒，从来不曾刻意求成，又不善于怂恿精进，故算作乃势在必然。好在日积月累，集腋成裘，倒也聚下了可观之数。而蔽帚自珍恐是人之天性，难免免俗，我也不揣陋庸，将旧作编成一集，年内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刊行。

寻词觅句琢文谋篇，原就是自己喜爱的事，倘无特殊因循，大概还会继续坚持。奇文共赏，疑义相析，如此赏心乐事，愿与好友们长长久久地共享下去。

如此赏心乐事

施小炜

满目霞光曙色晓
豪情共举春风香

毕业后留校，在外文系执教八年，1989年秋渡海赴东，在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留学六年有半，其后又任教于日本大学，滯东竟达十八年之久，远远超出了事先的计划。十八载当不算短，难免经历了形形色色，其中最难忘怀的，是成员仅有三人的“余亦吟社”。起社前因，是两位日本友人，啸月山人中尾氏与鱼溪居士福川氏，欲从我习做汉诗，遂由我拟定社名，借了太白“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”的诗意。每月开社一次，事先由我布置个宽泛松散的诗题，不拘体例，山人与居士做好携来，再由我细细修改润色。三人诗社坚持二载后，将作品集结付梓，是为后果，也算得是功德圆满。后来余亦吟社又坚持了一轮，社员各积作品廿余首，本拟再出一本诗集的，无奈嗒月山人遽然退出，又不肯言明缘故，第二本诗集遂成画饼，诗稿也不知所终了。

美蓉楼听燕语
芙蓉院见花飞
玉阶露冷斜晖
绿风春梦老
白雨海棠肥

欲寄相思万里
奈何人在天涯
吴山楚水几时归
横江挑叶去
烟树子规啼

又有《菩萨蛮》数阙，止录其一：

闲愁万种催人老
娇莺犹唱花犹好
香径柳如丝
斜阳细雨时

闻鸡惊蝶梦
舞剑同谁共
恐又起乡心
嗔怀莫近人

到了2007年，终于决意卷起铺盖，携妻归国定居。离东前，作五律一首，告别众师友，算作骊歌。诗曰：

阮展浪游倦，金风十八黄
无人延郭隗，有道遣冯唐
脚踏辽东鹤，仓皇浦岛郎
放歌归去也，挥手向吾乡

颈联对句用了东国浦岛太郎的典故，略类刘辰阮翁旧事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瞬归来已满十载。十年间，继续舌耕，教书之余做些日本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，同时作为兴趣，诗词写作也偶一为之。由于我生性疏懒，赋诗填词都是率性而为随意挥洒，从来不曾刻意求成，又不善于怂恿精进，故算作乃势在必然。好在日积月累，集腋成裘，倒也聚下了可观之数。而蔽帚自珍恐是人之天性，难免免俗，我也不揣陋庸，将旧作编成一集，年内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刊行。



一湾江水碧 万点桂山青（国画）白雪石

性本爱诗词

邹世奇

写一首首诗词，如果会足够长，就拣长的默写，记不起来的句子就省略，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一首《西洲曲》，不行再一首《琵琶行》，一阙《莺啼序》……时间过得飞快，再长的会都结束了。默写的时候，穿过时空的尘埃，只有我与古人凝神相对，自成一个小小宇宙，会场的神音仿佛能穿透幕布之外的市声，嘤嘤嗡嗡，埋头做笔记，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难得的好听众。有时我想，如果我没有读过那些诗词，那种时候，我又会在纸上写些什么？答案是无论写什么，都不如默写诗词。

诗词是讲究早期缘分的。一个从小不太接触诗词的人，很难想象成年后会有那个时间和心境去细读诗词；而且由于记忆力的因素，一个人能够下意识脱口而出的，基本都是早年熟记的句子。正是那些早年读过的诗词，无意中开启了我性喜词章之美的基因密码，后来完全不用选择地，我读了中文专业，硕士还读了古典文学方向，并在可以预见的余生都无法停止对文字的痴迷。谈诗词到底有什么用，我真的无法回答；

我可以回答的是，有一种“用”叫“无用之用”。

比如下面这阙词：

木兰花
晓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。
笙箫吹断水云间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
临春谁更飘香屑？醉拍阑干情味切。
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

敏感纤细、文采风流的他，曾经拥有一个烟雨江南的国家，拥有这世间最好、最繁华的一切，最后呢？昨日种种如梦幻，他竟落得连一身都难以保全，更不要说江山、美人、雕栏玉砌、春花秋月了。人世间自有大悲凉，天地无情，以万物为刍狗，个体的人在历史、时间中渺小如尘埃，而普通人所有的情绪——委屈、寂寞、悲伤、欢喜……都能在漫长历史中找到同侪。总有一首诗与你，藏在岁月发黄的册页里，等着与你相遇、给你慰藉、令你粲然一笑。当人生中有了诗词，失意时，境界可以阔大，精神可以高昂；得意时，也知道天地高广，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，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 微信二维码